

融入与重塑: 1920 年代的中国 共产党与民族主义思潮^{*}

宋 进 杨 旭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0241)

摘 要: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 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不同思想势力纷纷汇入民族主义思潮。思想主体的多元性使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复杂面相。至 1920 年代, 民族主义已成为社会动员的普遍话语, 政党也构成了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对民族主义拒斥到接纳的调适过程, 成功融入了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建构与批判的正反两方面行动, 中国共产党围绕“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在中国具体表征的批判, 从“反对帝国主义”价值逻辑上重塑了民族主义思潮。1920 年代中共的融入与重塑, 使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获得了新的面貌, 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 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果。

关键词: 1920 年代; 中国共产党; 民族主义思潮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3

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诉求, 它隐含在关于“救亡图存”的各种思想主张中, 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价值逻辑。直到中国共产党融入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方才逐渐获得了真正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民族主义思潮是如何生成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什么要融入民族主义思潮, 又怎样融入民族主义思潮? 又是如何从价值逻辑上重塑了民族主义思潮?

一 1920 年代之前民族主义的产生: 世界历史转变下新思潮之生成

在资本—帝国主义进军世界的强力意志威逼下, 近代中国被迫以西方列强视为“落后民族”的身份进入现实的“世界历史”。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转型时代, 近代中国发生了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评估这种改变的影响自然是关乎中国近代史之总体的宏大论题, 但就其对这一转型时代社会思潮产生、发育与流布的影响而言, 最重要的莫过于社会性话语空间的形成。

尽管不同的社会思潮, 可能由于核心议题、表达方式、作用范围和实际影响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具体形态, 但无一不带有“社会”的属性, 无一不存在于开放化(尽管程度有别)和理性化(逻辑形式规范性)的话语空间之中。这就是说, 社会性话语空间是社会思潮存在的必要条件。从社会性话语空间的三要素, 即传播媒介、知识群体和话语资源的建构及共生关系来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话语空间, 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形式即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暴力重塑过程。自 19 世纪中叶始, 作为对这种暴力冲击的回应, 引进并学习西方的器物与技术成为了近代中国的最初选择。“师夷之长技”客观上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兴起, 以及现代出版业的萌芽与现代报纸杂志的大批出现。随着它们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11BKS060)及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2010BKS002)的阶段性成果。

间联系的不断强化,这些传播据点也得以逐渐勾连为传媒网络。尤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与留学派遣培养的知识群体渐成规模。虽然甲午一战宣告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但在此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传播媒介和知识群体却随着甲午战后政治改革的兴起而日益兴盛和活跃。一方面,中央权力的全面衰落使传统高压的社会管控难以为继,政治结社大量出现,知识群体活跃性增强,传播媒介多样性;另一方面,制度取代器物与技术而占据了西风东渐的中心位置,论证制度合理性及其文化优越性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也随之大量引入,并作为话语资源迅速被知识群体接受和使用。总之,甲午、戊戌之际,近代中国社会性话语空间的构成要素均已生成并互相促进,从而为当时及其以降社会思潮的活跃提供了必要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上各要素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根本上是取决于一社会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对时代矛盾的认识或解决方案的分歧既构成不同思潮的区分,有时也造成同一思潮内部的分野;而对矛盾的认识程度以及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则决定了思潮本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问题本身及问题意识的社会属性,社会思潮一旦形成,必然会突破观念的畛域,谋求利用或发动现实的社会力量,从而将解决矛盾的方案设计付诸实施,并最终改变社会现实。

从社会思潮生成的充分条件来看,形塑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本质性力量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在1895年之前,尽管“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冲突已经凸显,但是矛盾及其影响尚能被社会—文化有机体所消化。因此,外部冲击引起的是“体用之辩”的应激性反应,以“天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社会历史观仍然据守着认识惯性和文化傲慢。作为话语资源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还没有条件到达知识群体,主流的民族意识仍然在“夷夏之辩”和“忠君报国”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中徘徊。与此同时,民众的自发抗争贯彻的仍然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①的排外主义和生存逻辑——民族主义的火药桶虽已装填,但它的总爆发尚乏自觉的引线。

1895年之后,外部威胁的程度开始超出社会—文化有机体的消化能力。旧挫新败积叠下无法疏解的现实压力和文化困顿感,使活跃的新知识群体开始“赞成把社会实体作为民族来保卫,并极力把这个目的摆在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加以考虑……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就登上舞台了”^②。时代矛盾的加剧和社会危机的紧迫,使民族主义诉求成为知识群体难以超脱的意识“黑洞”,通过某种变革而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了社会中心议题。不同的思想流派,鲜少拒绝戮力造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中国,且多数以此为思想鹄的。这一现实提示着“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运动,或者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到处弥漫的思想氛围”^③。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共同问题下,集结了从保守到激进的不同力量,容纳了落后性与进步性的冲突因素;而在回到“来处”还是去往“别处”,去往“此处”还是“彼处”的意见分歧中,各派思想势力绞缠角逐,并谋求发动社会力量以实现自身主张。

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缠斗后,“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膺虜,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④的激进一翼,率先与蓄积已久的社会力量相结合,获得了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力,从而发动了“毕其功于一役”^⑤的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虽则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的革命性结合,但却由于落后性力量的反噬而迅速瓦解。革命党固然实现了社会动员,但“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排满”口号虽然短时间内迅速激发了社会力量,但正如丘吉尔在一战后指出的那样,一旦这种极端的刺激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② [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③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④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苏报》,1903年7月6日。

⑤ 即指“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著作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页。

消失,巨大的、普遍的松弛和对日常生活准则的回归就很急迫,“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①,即便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也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②。思想力的上限决定了行动力的下限,民族国家成了纸上空文,民族主义思潮回落蛰伏。但低潮是暂时的,“民国落入反动派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之手后,革命的伏流不期然而然预备着更广泛、更伟大的民族运动,到了五四,这种革命的巨潮早已成熟,贸然的爆发起来。”^③

五四运动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史上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正“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④,它的爆发使民族主义思潮摆脱了辛亥革命后理念与行动的离散状态,将观念和现实领域中新出现的进步因素及其辩证统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在观念领域,五四运动前后,“民族自决”日渐成为社会热点。受新文化运动的催化,独断论价值系统被摧破,“重估一切价值”蔚然成风。价值多元论的炽盛为“文化生发期”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环境,更多西方思想理论,尤其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被引入中国,新知识群体掌握的话语资源量质齐升。同时,作为传播媒介的“日刊报纸已大发达,每日电报消息已大增加,是以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无论何处发生之情形均甚洞悉”^⑤。因此,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观念自“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⑥——在民族国家已在观念领域取得普遍合法性的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观念自觉已经进步为要求现实民族权利的“自决”。

其次,在社会领域,民族主义思潮所凭借的社会力量的组织性和广泛性有了明显提升。五四运动中的民众“比起以前来,大大不同。一帮又一帮的联络,一业又一业的预备,一处又一处的计划,合了这各业各处,再作成极周密极有条理的系统。这有意识的‘合理’行为,也是显示出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证据”^⑦。同时,社会力量的广泛性也空前增强。“从甲午、戊戌、庚子以来,中国对于外国的侵略,也每次都有些反应”,但是其作用“始终还不过限于士大夫之间(康、梁)这种对外反抗的运动”^⑧,至五四运动,不但知识群体、工商人士、一般市民群众,直至工人阶级都充实到民族主义思潮的社会力量中,为民族自决诉求展开实际行动。

至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预备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需的必要条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场,为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为标志的新内容,进而引导了1920年代以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进步方向。

二 192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融入与政党主导之新阶段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源于社会、关乎社会和属于社会的时代思潮。社会矛盾的深刻与复杂导致对矛盾的认识必然存在性质和程度的变化与差异,从而决定了社会思潮的变迁与多元。从思潮的多元性上来看,民族主义思潮展现出思潮的复杂面相。从思潮的变迁性上来看,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总是处在发展变化当中,矛盾或其主要方面在变,思想势力自身及其依托的社会力量在变,从而决定了思潮的动态变化。

对于某一思想势力来说,能否主导多种思想势力并存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这一思想势力能否凭借所掌握的话语资源取得社会性话语空间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又取决于这一思想势力能否通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②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孙中山著作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2页。

③⑧ 瞿秋白《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一五四一五一》,《上海大学周刊》第1期,1924年5月4日。

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⑤ 《远东问题自有公论》,《晨报》第118号,1919年4月12日。

⑥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著作选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3页。

⑦ 戴季陶《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过有效的社会动员掌握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主导一社会思潮的关键在于能否有组织地实现思想力量与行动力量的结合。而在诸种现代社会组织中,能做到这一点的,首推政党。只有政党组织能够最有效地统合思想力量与行动力量,并将其贯注于自身主张的实现过程。而力量的结合是否紧密持久,直接关乎政党目标能否达成,甚至影响政党的兴衰存亡。以此盱衡,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的成功发动与终归失败几乎如影相随。

在由五四运动打开大门的1920年代,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政党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党能够主导民族主义思潮主要在于:其一,政党逐渐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1920年代的实力政党或是经历清末民初严酷的政治洗礼而后重整新生的,或是能够在当时政党政治的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与晚清时期出现的政治结社和民国初年的早期政党相比,无论是在组织形式、开放精神、社会基础还是左右政局的能力方面都更成熟进步。其二,政党具备话语竞争优势。老牌实力党和新兴势力党的核心和骨干,既不乏早已名声大振的思想先驱,又吸纳了不少新知识群体中的优秀成员,加上政党掌握强势的传媒和话语资源;相较于其他个人或松散的社团,更容易在话语竞争中取得优势。其三,民族主义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能够在话语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政党,尽管政纲不同,但都有关于民族主义的实际主张;而民众在自发运动中也显示出民族主义意识的潜移默化,民族主义既能宣传政纲,又易使民众接受,因此成为政党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

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政党成为192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力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党。1920年代,三党不约而同地意图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来“发动”革命。尽管“阶级革命”、“国民革命”和“全民革命”的背后隐含着共产党之共产主义、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和青年党之国家主义的分殊,但在救亡图存的基本现实考量下,民族主义的优先性都被纳入了革命方案设计的高级序列之中。虽然革命的性质,关于革命的目标、对象和方式的设定不尽相同;但是三党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先后都融入了民族主义思潮。以民族主义为三民主义第一义的国民党自不待言;青年党虽然强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Nationalism”译法的不同,但实际的主张仍然在民族主义的问题框架之内^①。对于国民党和青年党来说,在革命的总体设计中安置民族主义几乎不费周章,在政党的社会动员中运用民族主义也是水到渠成。

也就是说,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政党,由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一般与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政党的目标、路线和政策往往与民族主义融洽相携,融入民族主义思潮也就很容易做到。但是,对于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中国共产党融入民族主义思潮就经历了一个“调适”的过程。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何谓融入了社会思潮?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融入一社会思潮至少意味着:承认该思潮的核心议题为真问题,并承认该问题应当先于其它问题而获得解决;也意味着: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案或支持(补充)已有方案,在此基础上直接实施该解决方案或敦促方案的实施。因此,融入民族主义思潮就意味着至少承认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最紧要的问题,并在此问题框架内提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具体方案,进而实施或敦促实施这样的方案。由是观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没有融入民族主义思潮。

从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②来看,在宣告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之后,接着就写到“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此《纲领》仅存俄文本和英文本,没有中文本。此句是从俄文本翻译的,英文本记载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无论取俄文本还是英文本的表述,都可以看出,中共在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拒绝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国家。

^① 参见李璜《国家主义正名》,载于《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23—124页。

^②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政党的纲领是该政党政治目的的表达。中国共产党在《纲领》中“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因此,“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代替民族国家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并且,这个政权的存在是以“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限的——这个替代了民族国家的政权也将随着“社会革命”的完成而消失。这显示出,《纲领》不仅否定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国家,而且也不承认“劳动阶级的国家”是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纲领》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否定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整个问题框架,当然也就不存在融入思潮的余地。

这种情况在中共二大前夕有了转变。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①中,中国共产党肯定了资产阶级政党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行动具有历史合理性,放弃了一大决议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的政策,提出“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但是在这个主张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涉及“国家”问题框架的纲领。

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纲领出现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③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了一大时提出的“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最高纲领”;另一方面则第一次提出了“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并且系统阐述了关于国家各项制度的主张,形成了一个共计七条,涵盖了民族国家基本问题框架的“最低纲领”。到三大时,又在这个“最低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形成了包括十八条具体主张的“最小限度的党纲”^④。从“最高纲领”到“最低纲领”,再到“最小限度的党纲”,这三次关于党纲的阐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一个拒斥到接纳的“调适”过程。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具体和深化。“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不仅是理想与现实,也是目的与方式、原则与手段的关系。没有“最高纲领”的引导,则革命的性质就会改变;没有“最低纲领”的实现,则革命的任务无法完成。理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是在对变化中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矫正对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认知龃龉,这是共产党得以融入民族主义思潮的前提。

如果说一大的“最高纲领”展现的是中共对“两个必然”的坚定信念,那么之后的“最低纲领”和“最小限度的党纲”则意味着“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激进的主张”^⑤,开始在“两个决不会”的认识基础上正视和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紧张。事实上,即便是指导俄国成功实践了“两个可能”的列宁,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列宁在1913年时曾激烈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⑥;而晚年则审慎地认为“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⑦。正如中共三大报告所指出的,“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参加现实的运动”主要就表现在“共产党因为见到要渐进于共产主义,必须先联合各阶级打倒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⑧,也就是国共合作的方式融入民族主义思潮。

三 192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重塑

中国共产党对融入民族主义思潮的边界与目的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即“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

^{①③④}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8—98页;第120—135页;第248—255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一九二一年七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⑤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

^⑥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

^⑦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1922年12月31日),《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

^⑧ 恽代英《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

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①。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认识上,更需要在实践中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一方面,要通过领导和掌握劳动阶级的力量,“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②。另一方面,要防范民族主义消解阶级斗争,“宣传民族的党和阶级的党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③。也就是说,融入思潮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利用融入的契机发挥引领作用,确立自身在思潮中的主导地位,使之能够渐入于革命性的进步方向。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努力反映在建构性和批判性的正反两个方面。从批判性的方面看,主要体现在通过与歪曲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右派和鼓吹国家主义的青年党的思想斗争,取得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话语权。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阐发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生涯末期的重要成就。新三民主义不仅是“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④的理论成果;也是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但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右派势力,以纯正三民主义的名义,“极力排斥国外最反对帝国主义的苏俄,极力排斥国内最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极力排斥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人农民之阶级斗争”^⑤;实则是消解新三民主义的进步因素。对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发布全党通告,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政治斗争,以巩固国共合作^⑥;一方面组织理论力量,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三民主义,并开展对戴季陶主义的思想斗争,以维护新三民主义包含的进步因素^⑦。

此外,针对国家主义派揭橥爱国和救国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蛊惑性主张,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三民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斗争,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⑧。因此,“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⑨。为此,中国共产党还专门出版了《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⑩进行系统的批驳。

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相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也常在论战中进行阐发。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总是在不断批判和扬弃中发展的,因此通常会面对不同思想势力间的话语权争夺;而理论的批判逻辑和解释逻辑也往往在论辩和回击中得以强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进行大力批判,固然不能排除维护政党自身利益的因素,但从批判对象的性质和力量来看,是因为这两者都是

① 参见《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

② 参见《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6页。

③ 参见《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一九二五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

④ 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国民新报》特刊,1926年3月12日。

⑤ 陈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

⑥ 参见《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载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第600页。

⑦ 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中提出“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

⑧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8页。

⑨ 《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载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0页。

⑩ 原书出版于1925年10月,约3万字,作者为萧楚女。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2—599页。

192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逆流,且皆具备一定的社会力量基础,因此都有将民族主义思潮引向专制和倒退的实际危险。中国共产党的揭露斗争正是结合建构性之“正”的一面,从批判性之“反”的一面,掌握话语主动,驱散思想迷雾,从而引导民族主义思潮向革命方向发展。

从建构性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在融入民族主义思潮之后,以资本—帝国主义理论接驳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从而赋予了民族主义思潮在“救亡图存”之上的世界历史意义。这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尤其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围绕“帝国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具体表征,创造性将民族主义思潮中“内”与“外”相分离的两重面相融合接榫,进而重构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价值逻辑。

尽管“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认识的时间较早^①,但中国共产党融入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潮还难以从价值逻辑中剥离“帝国主义”。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将“帝国主义”视为西方民族主义历史进化的结果。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者认识的进展,虽然对帝国主义的道德谴责和学理分析渐成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强势话语,但这些偏离唯物史观思想基轴的认知无法承担从世界历史体系中超拔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任务。在面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现实鸿沟时,只能或错置或空悬民族历史主体性的社会存在基础。因此,在帝国主义世界霸权体系的结构中,无论是强调国家政权(安内攘外)还是强调民族文化(内圣外王)的“救亡图存”主张,都因为在不同层面割裂了“内”与“外”的本质关联而无法达至颠覆世界历史现实秩序的彻底革命性,“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②。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武器的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将现代性的成就(民族独立、工业化和人民主权)与被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斗争、自我解放和以劳动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以生产工具的改进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发展)结合起来,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将抗拒外来侵略和内部压迫的斗争转化为一种历史主体性的生成过程”^③。

在融入民族主义思潮之后,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与解释逻辑,揭露了内部压迫与外来侵略的共生关系,指出“军阀自身究竟没有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的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④,从而以世界历史性的理论视野,明辨了以往被割裂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对象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体两面,进而重构了民族主义的价值逻辑。“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⑤,而涵盖了这一目标的“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落后民族历史主体性的建构不仅要“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⑥。只有颠覆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世界革命,才是落后民族进入世界历史的唯一可能途径,也只有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才应当成为民族主义的价值归宿。

对民族主义斗争对象关系的世界历史性重构,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思潮的价值逻辑,也使“打倒帝国主义”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话语资源。“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

① 关于“帝国主义”概念在汉语思想界传播的文献研究,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更全面的分析,参见李时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的帝国主义观和民族主义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年第2期;尹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②⑥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

③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页。

④ 陈独秀《怎样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⑤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①。

在融入民族主义思潮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历史的自觉工具的姿态,致力于将源自生存逻辑的“日常的争斗”,“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②。在由中国共产党重构的民族主义思潮价值逻辑中,这两种斗争的历史交集正是结合了外部侵略与内部压迫的“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的民族主义社会动员,“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③。与辛亥革命用于社会动员的“排满”不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直接揭示革命长期任务的同时,也极易与动员对象“日常争斗”的现时诉求——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相互串联,从而将革命目标直接转化为行动口号。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实现,首先在于“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④。

因此,“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作用,不但在于斗争对象的逻辑重塑——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咎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而且在于当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尚未取得社会法权时,通过融构动员主体的理论逻辑与动员对象的生存逻辑,产生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这在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或参与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及其它民族主义运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峰。

中国共产党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建构和政治动员,是围绕“反对帝国主义”即“彻底的民族主义”^⑤进行的。这并非仅是迎合社会心理的动员策略,也并非仅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简单复制,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实践。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中国革命理论逻辑的高度浓缩,它的具体运用常常能够根据环境和受众的特点灵活变通而表现出策略性,但变通的目的在于通过抽象的批判逻辑在现象分析中的具体化,为“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化开辟现实道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⑥,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提供“从具体进入抽象”而凝结的批判和解释逻辑,但无法包办指导不同实践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所必需的理论再建构过程。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实践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责任编辑 唐忠毛)

① 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② 《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③ 《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④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⑤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

⑥ Ronald Robinson, *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with or without Empire*.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 273.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by QI Wei-ping)

Abstract: New situations have appeared since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was put forward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e to the refractoriness of corruption, the task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is destined hard and long-lasting. To reduce and restrain the amount of corruption has been a new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combat against corruption.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orruption is to deal with what already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to restrain the amount of corruption is to face the problems that may appear in the future. These two aspects supplement and influence one another. At the request of overall strict governing of the Party, to bring the special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road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into a full play i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a healthy and scientific road. The Chinese road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shall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actice of “prevention first” and “punishing second”.

Keywords: combating corrup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evention first”, “punishing second”

The “Lack of Faith” or the “Absence of Society”: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Faith

(by LI Xiang-ping)

Abstract: What is “faith”, and what is “society”? These two terms are used most frequently but they lack strict sociological definitions. “Faith” seems to be religious, but it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practical power, profits, individual ident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aith modes. A discussion of faith or religious faith seems to be immediately inserted in a context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realistic relations, which consequently forms the issue of the ways of faith in China. Is there a “social” domain independent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s far as the ways of faith are concerned? There is no determine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in complicated context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order *tianxia*, modern nation and r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state and economic market. It is due to the absence of “society” in a sociological sense that the mass people’s faith almost becomes an issue of seeking practical personal benefits and then mutated into a privatized way. Thus,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way of faith are deeply separated, resulting in the missing of profound and normative moral resources at the layer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f faith.

Keywords: the ways of faith, privat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products

China’s Intellectu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West”: Comments on the New Academic Work *Changing Referents* of Leigh Jenco, a Young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

(by LIU Qing)

Abstract: By treating the intellectual debates in modern China as a paradigm of “learning from the other”, the new academic work *Changing Referents* of Leigh Jenco, a young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 provides new methods and ideas concerning the issue how western theories overcome western centralism. This also reflects a current new trend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West”: western scholars attempt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ity of universal theorie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practice.

Keywords: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western centralism, the spread of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West, a new trend

Integrating and Reshaping: the CPC and Nationalism in the 1920s

(by SONG Jin & YANG Xu)

Abstract: At the age of world history, different thoughts that dedicated to “saving the country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flowed into the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was complex due to its pluralistic subjects. In the 1920s, nationalism had become a common discourse to motivate the public with the party as its dominant interpreter. Nationalism was firstly rejected and then accepted by the CPC. The CPC rebuilt nationalism by constructing and criticizing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imperialism” after examining the essence of “imperialism” and its manifestation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and reshaping, the CPC gave

nationalism a new look in the 1920s , and the CPC's leading role in shaping the nationalism was just a resul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words: 1920s , CPC , nationalism

The Process ,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y TANG Hai-yan & ZHANG Hui-qing)

Abstrac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can be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 and its shaping and developing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mode and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country. There are some theoretic logics and inherent discipline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a global product networks ,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an exogenous and extensive style to a balanced , inclusive and intensive one. The essence of transformation is to enhance China's status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However , it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to transform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re may be some risks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 China's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must grasp the key points as follows: (1) insistence o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 realizing the evolution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2) complying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ransferring ,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markets abroad and at home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o create an updated version of 'Made in China'; (3) 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e of firm by considering global value chain , fostering the micro subject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nternet Plus' plan; (4) optimizing trade policy by the new thinking of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Keyword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value chain ,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 risks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Developing Strategies of Inter-provincial Tourist Destination Market: An Experience Analysis with a Spatial Panel Model

(by FENG Xue-gang & HUANG He-ping)

Abstract: While the "push" force in the "push-pull" theory explains why the tourists travel , the "pull" force explains why the tourists choose the destination instead of others. Factors concerning destination "attraction" constitute key variables for the direction ,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 tourist flow.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ttractive power of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s , this paper chooses six key variables which affect the direction and quantity of a tourist flow , using 10 years of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13 of 31 province/cities/autonomous region , and identify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each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graphical adjacency and space distance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flows in each province ,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estination market development potential can be measured in the dimens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endowment , climate comfort , traffic conditions and so on , which can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ourist destination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ourist flow regulation.

Keywords: tourism destination , tourist flow , market potential ,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s , spatial panel GMM Model

Brand Values: Three Studies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ountry Brand of China , China's Business Brands and Thei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by HE Jia-xun & WU Yi)

Abstract: Based on the human values structure proposed by Schwartz and Boehnke(2004) ,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survey , content analysis ,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introduce the new concept of "brand values" through three studies. The purpose is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Chinese values to build Chinese brand concepts. Study 1 shows that "China" , as a country brand , embodies brand valu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Chinese culture , but possesses differences in some value dimensions between consumers from